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昆明的三任市委书记仇和、张田欣、高劲松连续落马,这再一次引起人们对反腐败重点对象,也就是中央最近经常提到的“关键少数”的关注。

“关键少数”,就是指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一把手”。他们在一个机关或者一个单位里的地位特殊,常常位高权重,掌握着最重要的权力资源、人事的、财务的、项目的、案件裁决的,等等。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透明机制和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就会导致权力的失控、滥用甚至

不法交易,从而使“关键少数”的领导职位,成为腐败频发、前腐后继的“高危岗位”,甚至破坏公共权力运行的良好“政治生态”,出现“窝案”“串案”等塌方式腐败现象。

事实上,“一把手”连续性腐败事例,已出现过多起。河南交通厅先后有四任厅长被查实存在违法犯罪行为,广东茂名十余年间的四任书记中有三名已落马,而山西太原则有三任市委书记和连续任职的三名公安局局长涉及职务犯罪。凡此种种,都反映出我们面临的反腐败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也说明加强对“一把

手”的权力制衡,正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反腐败法治化,不仅在于通过修改现行刑法,去最严厉地从重处罚已构成贪污受贿、渎职擅权的“老虎”和“苍蝇”,更应当通过严密法网,健全权力的分工和制约机制,科学设定不同岗位的权力清单和透明细则,将它们制度化、法治化,并实施常态化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腐败现象的存量,控制其增量,实现标本兼治。

从经验上看,对“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的权力制约乃至有效监督,始终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特别是

游伟

曾经有过实绩贡献、具有较强能力甚至个人魅力的领导,其权力的滥用与腐败,会与“能干事”“干成事”交织在一起,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因此,将权力分工明确化,将权力清单透明化,将权力监督常态化,坚持依规则办事、按法律判断,才能使权力的运行正常化、科学化,防止权力成为交易的对象、谋私的工具。

应该认识到,法治反腐的本质就是要通过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去科学设置各种公共权力的边界,防范其越界滥用。虽然,生活的经验不断告诉人们,凡是有权力存在

的地方,都可能出现权力的滥用及其与金钱、利益的直接、间接交易,但从实际状况看,无论是在权力结构的设置,还是在组织部门的观念和人事安排上,人们似乎还是更愿意相信某些“一把手”的信念或能力,寄予他们更多的信赖,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他们对理想的坚守、对事业的忠诚。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规则层面和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对重要岗位“一把手”的权力规制存在明显缺陷,表现为弹性有余、刚性不足、制衡疲软。事实证明,这样的思维模式和制度设置存在着严重的漏洞。

实践经验不断告诉我们,对法律制度构成最严重破坏并且也最能有效控制的,恰恰是某些官员的贪欲和他们手中不断膨胀的权力。而所谓“法治”,其实就是社会上永远存在着一把呵护公民权利、制约权力滥用的利器。而能不能真正管住各级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能不能在他们权力运行之初就及时进行法律规则的约束,正是衡量反腐败制度有效性的一把标尺,也是检验法治反腐成效的一块试金石。(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我妈是我妈

任大刚



两千多年前有两个蠢货,分别留下“刻舟求剑”和“郑人买履”的著名典故。故事人人会讲,错误一直在犯。

话说最近北京的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可问题来了,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上,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有人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开这个证明。光想到到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头疼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

制定这项规定的人就是当代刻舟人或买履者。他们不知道今天一代和下一代分开居住已是常态,人口流动如何迅速,不仅想当然地认为这个社会还是静态的,一嗓子可以喊来全家人,也未考虑到用网络技术解决远程身份证明的难题,而是按照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来老习惯中规中矩办理公务,实则成了变革时代的绊脚石。

按规矩办事本来是好事,但要看规矩是否合乎理性,让人跑上千公里开具母子关系证明的规矩就不合乎理性,而近于疯狂。这样的故事,韩非子还讲过好几桩。

一本古书上有过一句话:“绅之束之。”这话表面意思是系上大带子,再系上小带子,引申为严格约束自己。宋国有个人读到此处,就往自己腰上反复系上带子,有人问他,“你这是干什么?”他回答说:“书上是怎么说的,当然要这么做。”

这个研读古书的人,与要求陈先生提供母子关系证明的人,有何本质区别呢?

不过一板一眼按规矩来,误打误撞,偶尔也会取得一些出人意料成果。

燕这个地方的个人给燕国的相国写信。晚上灯火不太明亮,他对拿蜡烛的人说:“举烛。”他嘴上这样说,还真把这两个字误写到信中了。

燕相国收到信,见到“举烛”二字,就解释道:“举烛”的意思,就是崇尚光明,崇尚光明,就是举荐贤能人士。”于是燕相国把举贤能的意思告诉燕王。燕王听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燕国因此得到善治。

韩非子感叹道,国家是治理好了,但这并不是那封信的本意,当初被提拔的很多学者就是这类人。

因循守旧,不能跳出来解决实际问题,只知道按照权威和经典谋划实际事务,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经学传统,这在思想领域尤其常见,能够把“举烛”解释得合乎治国大道,太不容易蒙对,但在今天的教育实践中,这种情况仍然屡见不鲜。

比如但凡在中学教科书中学过鲁迅先生作品的,几乎都像燕相国那样,想方设法、绞尽脑汁诠释其中的某句话、某个字,乃至一个标点符号。丝毫不敢有所质疑,有所逾越,结果诠释过度,成为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难怪中学校园里曾经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叫做:“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

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先生最近也批评道,现在的语文教育存在很多的“假语文”。《“再别康桥”》是诗人徐志摩对友人和情人的怀念,有些老师非得说它表达了诗人热爱祖国、热爱故土的情感。”王先生没有进一步指出的是,这是一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啊。

与守旧、固步自封,再到试图突破却洋相百出地“解经”这一深厚传统相比,“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不过30多年,出现诸如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如何证明自己是单身、如何证明自己没有犯罪记录式的怪象,一点都不奇怪。



“互联网+”的概念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在股票市场也成为热炒的题材。两年前,我们还在怀疑“支付宝”安不安全,“余额宝”有没有本金风险,而互联网产业迅猛的发展势头已经让支付宝、微信支付渗透到日常生活诸多领域:打车、超市购物、餐饮等等。攻占了金融,下一个目标又将是什么?自然少不了同样攸关民生的教育和医疗。

互联网教育已不新鲜,国外的Coursera、国内的网易课堂这类项目都在近年积累了喜人的经验,未来把大学开到网上似乎真的不再是天方夜谭。可是,互联网医疗在没有现场“望闻问切”的情况下,怎么开展呢?国家卫计委发言人宋树立日前表示,互联网上,除了国家严格监管的“远程医疗”,其他涉及医学诊断治疗是不允许开展的,只能做健康方面的咨询。这一规定的初衷显然是出于对人类生命个体最大的尊重。现场诊治尚且可能引发纠纷,所以现阶段在对互联网技术打造的新环境、新形势还不十分熟悉的情况下,保持高度谨慎,无疑是最佳策略。

那么“互联网+”模式下的医疗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呢?监管下的“远程医疗”是较高水平的医疗机构向一般医疗机构提供咨询,或直接向患者提供诊疗服务。这固然可以为患者和一般医疗机构省下不少麻烦,譬如不用再从偏远地区赶赴京沪穗等全国顶尖医疗资源集中的城市。但是,较高水平的医疗机构本身并没有减轻负担。相反,可能任务会更多,责任会更重。就医难的局面会不会从单一的候诊大厅人满为患升级成

朱绩崧

实体候诊大厅与互联网候诊大厅都人满为患的复合型资源稀缺?这是开展有限资质的互联网医疗必须警惕的问题,毕竟优质资源的数量在短时期内是恒定的。

谈到互联网模式,“大数据”是当下最时兴的术语。大数据可实时监控医疗资源的分配,如果能在互联网医疗中发挥指标作用,那么在三甲医院之外,大量质量可靠而长期未得到充分重视的诊疗资源能否被调用起来,找到用武之地呢?

前天,我读到报纸上一则新闻,说浦东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暂行办法,意在用“卫生八条”为农村留住好医生。原本农村为什么留不住好医生?路远,收入少这两项是重要原因。如果发展好了互联网医疗,路远?不怕,有网络。收入少?也不怕,农村医疗机构如果患者不多,那就去网上找病人看。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只要医道高明,岂会收入菲薄?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舍互联网其谁?

说来,我前阵子还尝试过一次“自助式”的互联网医疗。我常年游泳,几个月前,右足局部奇痒,皮肤发红,我就拿手机仔细拍了几帧照,发给两位学弟学妹看。他们都是皮肤科的医生。先后收到一致诊断:“典型的脚癣——不用费事去医院挂号了。自己拿上医保卡,去药房配‘兰美抒’药膏。天天涂,保持足部干燥,游完泳要擦干脚。不要再穿酒店提供的公用拖鞋了!”依计行事,迅速康复。当时,我就感叹,互联网至少在对付这种癣疥之疾方面,还是颇具奇效的。

我更相信,只要抓紧监管,控制风险,开发资源,用足条件,凭着咱们这代人的智慧和勇气,互联网医疗在如此泱泱大国,必定大有可为。

我们都在路上

姜泓冰



中国的道路,就像中国社会运行的直观缩影。

这样想时,我正驾驶着一辆小小代步车,在通往D路口的转弯车道上乖乖排队,远远地看着红灯翻绿又翻红。前方相邻车道上,几辆预备插档车歪斜杂乱地占用了半根直行车道;更“聪明”的人连这点等待都不肯,直接利用信号灯放行时间差抢进了路口的左弯待行区。

D路口是上海中心城区一条东西主干道与一条南北向小马路的交汇地,转弯车道绿灯时间不过30秒。在下班高峰期,等上三四次红绿灯交替,是如今的“新常态”;若顺利通过,那必是因为出现了疏堵的交通。透过绿化带,看得见路边老旧小区有限的几个停车位,待到终于转弯过去,空车位可能早已被占。于是,要不要跟风变道插队,这念头时常会盘旋在原本惯于克制和循规蹈矩的头脑中,形成纠结和焦虑感,冲击着自我设定的行为底线。

在百无聊赖的等待中观察,可以发现,在硬性变道插队的车辆里,既有豪华跑车也有坑坑洼洼小货车,既有大公交、出租车也有私家车,既有“沪字头”也有外牌车——金钱多少、社会层次高低、户籍归属的身份不同,并没有带来守法和道德水准上的差异。相反,在道德自律和遵规守法上,我们都是向着最低水准看齐的,有样学样,插队者往往既不为急事也无任何打招呼求谦让的意思,插队既成,车屁股上甚至会透出自以为高明的洋洋得意表情。而三四年前还是秩序井然、安静的一个小交叉路口,如今已是各种抢行挡道封堵、乱按喇叭、人车混杂穿行、险象环生。一些车辆只为个人占得一点小便宜而不顾公共空间安全、秩序的劲头,常让人想起几百年前法国国王那句“在我身后,哪

管洪水滔天”的名言。然而身在其中,倒也很有一批人如我,慢慢练就了泰然处之的耐力,不焦躁,也不因为“反正已经很乱了”“这不公平”,或是利用熟悉地形和潜规则的优势而去轧一脚、添些乱。我将它设定为一个社会道德建设和公民自觉的一点萌芽。

交通渐成城市大问题。在不久前公布的世界拥堵城市前30位排行榜上,中国占了11个。上海居然仅位列24名,低于排名12的重庆和排名15的北京,在上榜的中国城市里排名第7。在某程度上说,该归因于这座城市在交通上的动足脑筋和科学管理水平。那些花样经多多、开车都得抖机灵的单行道、可变车道、越分越细的信号灯控制,足以让粗枝大叶的外地司机懵圈。早早开始的汽车牌照拍卖和外牌限行,顶着“世界上最贵小铁皮”和“排外”的重重舆论压力,走到今天,压力依旧依大,却也不能不叫人敬佩上海的管理眼光和思维。

虽然高峰时间快速路的外牌限行时间延长,但上海中心城区路上的外牌车、无牌车显然还在增多。昨天有消息说,本月预计有超过14万人参与那近1万张的车牌竞拍。

几天前,在通往延安路隧道的车道上,实线变道挤进的一辆车尾部标语居然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他的正前方头上,其实已有可实时公布违法车辆牌号的装置,只是不知为何,愚而末行,滚动公布的时候并不多,以为“狼来了”而收敛一歇的司机们又“老鬼”起来,肆行依旧。

一个法治社会,一座超大城市,立法执法,权力者带头守法,以制度管人,是首义;每个人在求一己私利私权最大化最强硬的同时,也应明了维护公共空间秩序、完整性的重要性,从知识或精英阶层起,自觉行为,也不可缺。有钱任性或无产无赖,都不得在公共领域里被张扬放大。